



● 作者/John Garnaut ● 譯者/余振國 ● 審者/黃依歆

澳大利亞的赤色風暴

How China Interferes in Australia: And How Democracies Can Push Back

取材/2018年3月9日美國外交事務網站專文(*Foreign Affairs*, March 9/2018)



圖為2017年印度成功發射之南亞衛星。
(Source: ISRO)

160年以來，華人如浪潮般湧入澳洲社會，挹注該國之經濟成長。圖為雪梨之中國城。

(Source: Flickr/Lenny K Photography)

中共透過在他國操縱政商關係與打壓媒體等行動，威脅民主國家的脆弱性。面對此種暗中干預的外交手段，澳大利亞已立法反制，而各國需借鑒此先例，警覺面對這場赤色風暴。

澳大利亞猶如煤礦坑中的金絲雀，預警世人中共的干預作為。過去的18個月裡，中共一直被指控在暗中操縱該國的政治體系，策劃更廣泛之政治佈局，企圖撼動澳洲。傳聞指出，一些與北京關係密切的政治獻金者，以金錢購得通往該國政界的管道與影響力，某些大學淪為「宣傳機器」，而由坎培拉政府資助的科學研究被轉用於幫助共軍現代化。最惡名昭彰的是，一位野心勃勃的年輕參議員鄧森(Sam Dastyari)遭揭發而強迫提早退休前，已如同鸚鵡學舌般傳述共產黨的論點，並為一位中共政治金主提供反監視建議。

談論這些醜聞，可能會讓人覺得奇怪。因為世界上很少有國家能像澳大利亞那樣明顯地受惠於中國大陸。長達160年來，華人移民和旅居者如浪潮般湧入，使澳洲社會豐富多姿。根據澳洲儲備銀行的資料，多虧了中共資源密集型建築業的興盛，使得澳洲國民所得在過去10年內成長了13%。而且每年18萬名中國大陸留學生和100萬名遊客消費力之挹注，加上為數眾多的移民在渠等新國家中成功發展已彌補了澳洲降溫的資源熱潮。

然而，這些正是澳洲討論中共影響力時饒富興味之處。當一個中等規模、開放、多元文化的國家堅守立場，對抗一個崛起中的專制超級強權，而當中共這個超強占澳洲出口金額的三分之一時，沒有人知道會如何演變下去。即使是中共小報的煽動式社論寫手也不甚確定。《環球時報》寫到「澳大利亞自稱是一個文明國家，但其行為令人費解，雖然它在經濟上依賴中國大陸，但卻沒有表現出多少感激之情。」

澳洲內部的討論，已從對中共影響力與軟實力的無形焦慮，轉





化為對其暗中干預感到更為明確的擔憂。媒體報導揭露了這個暗藏誘惑、威脅及貌似合理推諉的世界，內容揭示了在經濟吸引力和軍事力量這兩極之間的風險範圍，這是西方的漢學家、外交官和國安官員之前從未關注過的。然而，當吾人瞭解愈多，似乎就愈覺得中共超越界限行使權力的方式不夠厚道。

澳洲經驗的特殊之處不在於中共在當地做了什麼，而是坎培拉在面對來自北京的威脅，以及當地商界領袖擔心經濟報復的壓力下，如何做出反擊。唯有將問題釐清後才能對症下藥，方法就是試圖在維持整體計畫的同時，管控風險和找出傷害對方之處。上述所說的反擊並不容易找到一個中庸之道，而且華府、奧克蘭、渥太華和柏林領導人也愈密切關注坎培拉的因應作為，否則渠等可能很快就會發現，自己也面臨類似處境。

華裔澳洲人領頭激辯

中共在澳洲運作的關鍵，是將中國共產黨、中國大陸和

華裔人士的分類打散成單一的有機整體，直到把「共黨」概念從文雅的對話中完全抽離。這樣的整合意味著針對共黨活動的批評家，很容易會被貼上反「中」、反華、恐華的標籤，因此分化與扼殺了有效的對話。而不論公民身為何，聲稱所有華人都是「祖國兒女」只是一個簡單的邏輯步驟。

然而，相對於恐華的說法，在澳大利亞有關中共勢力如何滲透澳洲的辯論，一開始就是源於澳洲華裔社區。華裔作家、企業家和活動分子是第一批人讓澳洲社會注意到中共竟透過監督、脅迫和吸收等手段，來壓制渠等多樣性言論。

2005年，前中共外交官陳用林在叛逃後披露，中共擁有一個龐大的線民網絡，密切監視澳洲當地華人的行為，其中包括公開反對中共路線的法輪功成員。他解釋了中共如何利用這些資訊採取針對性的強制行動，例如沒收護照、拒絕簽證申請，以及中止面談。澳洲華裔作家楊恆鈞披露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聖火傳遞期間，中共動員數千名揮舞紅旗的學生，在坎

培拉議會前以「保衛神聖奧運聖火」為由，對抗藏獨團體及其他抗議者。2009年，澳洲鐵礦巨頭力拓集團高級主管胡士泰被捕後，幾名華裔澳洲企業家均表示，渠等被中共國安系統密切監視，而這是其他澳洲企業家所未有的待遇。這些人都曾因捏造的指控被判入獄、財產被剝奪，並在審訊期間受到不當對待。如吳植輝(Matthew Ng)、鄒婉玲(Charlotte Chou)和杜祖英(Du Zuying)等人的荒誕悲歌，皆因渠等及家人選擇向外界公開不當遭遇，還一度登上澳洲媒體的頭版新聞。

最近，澳洲華裔記者們也以中共在澳洲政壇的暗中聯繫為題，撰寫了調查報導。《雪梨先鋒晨報》北京特派員溫(Philip Wen)揭露了中共如何「偽造」一場草根政治運動，塑造只要是中國大陸人都支持北京政策和領導人的印象，試圖淹沒反對者的聲音。他還發現，澳洲政治人物對出資贊助渠等競選活動的中國大陸公民背景並不瞭解，甚至連真實姓名都不知道。學生記者喬斯克(Alex Joske)則因為母親生長於北京，擁有流



有關中共勢力滲透澳洲的論戰，最早就是源於當地華人社區。(Source: Flickr/Christoph Settgastr)

利的中文能力。他研究了中共的「統戰」網絡，稱這股勢力現在幾乎無所不在，並掌握著充足的資源，許多華人社群與政治圈的獨立人士因此被排擠在外。他也揭發了這些網絡是如何運作以使華裔澳洲人噤聲，並分享了自己被當地中國大陸學生與學者聯合會會長恐嚇的經歷。

這些華裔澳洲人每揭露一個由中共主導的脅迫與吸納行動，都意味著類似的故事至少有數十件尚未曝光。一名記者告訴筆者，他曾被請到一間卡拉OK酒吧並遭人毆打，對方則是為了報復他所寫關於某中共國營企業在澳洲的交易報告。另一名記者提供澳洲國會委員會一份機密檔案，詳述了北京如何透過威脅廣告商，試圖扼殺澳洲境內最後一個獨立中文媒體平臺。在此類案例中，

一家位於中國大陸的廣告商在中共國家安全部官員前來「駐點」兩週後被迫妥協；在澳洲，另一位廣告商被中共領事館請去「盤底」三小時後，同樣撤回了廣告刊登。相對地，親北京的媒體可以在內容、設備及商業機會上享有自由。

外國干預下的脆弱性

中共投入了大量資源來抵制不利的言論，並提供激勵措施來扶植更多利己的聲音。根據美國前情報分析師馬蒂斯(Peter Mattis)的說法，中共中央統戰部力圖「動員黨的朋友打擊黨的敵人」，不僅打入了澳洲的華人離散社群，甚至還透過統戰組織「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澳洲分會」(Australian Council for the Peaceful Promotion



of Reunification of China)延伸更多觸角。類似的共軍情報系統運作平臺，如「中國國際友好聯絡協會」(China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Friendly Contacts)，透過與出於自利或不知情的代理機構合作，外包中共的訊息運作。這類操作方法是對感興趣者提供特權管道，與之建立個人層面關係，並獎勵那些忠實為中共傳述建議談話要點的人。

威權主義的干預是以各種方式探測和利用民主國家的脆弱性。澳洲的脆弱性包括大學和媒體籌資模式的崩潰、競選集資法的監管鬆散，以及試圖對退休政客一視同仁的輕蔑。中共干預侵蝕了開放、民主和多元文化系統的信任基礎，還能腐化澳洲的政治程序。如果有朝一日直接影響到了議會制度，便意味著中共已侵入了澳洲政治主權的核心。2017年5月，中共政法委書記孟建柱警告澳洲工黨反對派領導階層，《「中」澳引渡條約》流產後將可能導致嚴重的選舉結果。《澳洲人報》報導：「孟建柱認為，如果中共代表得告訴澳洲華人社群，

工黨不支持澳『中』關係，將是一種恥辱。」

中共在澳洲某些地區偏好壓制批評聲浪的行為，已深深內化。有關中共影響力的第一本書籍著作、由漢米頓(Clive Hamilton)所著《無聲入侵：中共如何將澳大利亞變成傀儡國家》(*Silent Invasion*)已連續遭到三位出版商的擱置，原因是自發性擔憂北京的報復。同樣地，幾位澳洲大學領導者公開駁斥了來自中共的不當壓力，包括忽視來自校內學者的呼籲，同時也做出補救措施以緩和所擔心的經濟報復發生。

坎培拉採取行動

近幾個月來，這種默默入侵的陰謀不斷遭到來自記者、學者、安全官員和政治人物的聯合挑戰，形成一個催化的過程，包括澳洲國安機構比以往更加清晰向民眾提出警告；記者則以此為據，採訪學者專業意見；而政界人士也開始認真看待安全機構和可信媒體的調查。

2017年6月，澳洲廣播公司和費爾法克斯媒體(Fairfax Media)的聯合調查顯示，澳洲安全情

報組織(ASIO)已向主要政黨發出警告，兩位當地最慷慨的捐助者「與中共有密切的聯繫」，而且「捐款可能帶有附加條件。」其中一位以40萬澳幣的政治獻金為代價，試圖軟化工黨在南海問題上的立場。費爾法克斯記者麥肯錫(Nick McKenzie)還透露，一位自由黨貿易部長離職後，直接轉到一家具中共背景的公司從事顧問工作，並以年薪88萬澳幣作為酬庸提供不明內容的服務。

2017年年底，隨著媒體報導接連曝光，澳洲總理騰博爾(Malcolm Turnbull)的自由黨聯合政府宣布，不能再容忍參議員鄧森與「外國特務」間的合作關係。在金主威脅要撤回40萬澳幣的捐贈後，鄧森已被證明立即一字不差地表述金主認可的北京南海論點，還曾提醒已被澳洲安全情報組織視為威脅的華人金主，要注意電話安全以防監聽。騰博爾政府的攻擊言論儘管有黨派的政治目的，但也把外國干預問題搬上了檯面，並首次表明政府的容忍是有限度的。

騰博爾透露他在2016年8月



澳洲總理騰博爾已制定一系列反外國干預之政策。(Source: AP/達志)

已授權對外國勢力干預情形展開分級調查。調查結果已「驅策」政府制定四項原則的策略。首先，反外國干預策略是針對外國政權，而不是懷疑在外國出生的澳洲人忠誠度。如騰博爾所說，「我們的離散社群是解決方案之一環，而不是問題。」其次，該策略並未指明專門針對中共的干預；第三，此策略區分了「隱晦、貪腐或脅迫性」的行為與合法透明的公共外交行動；第四，調查將建立在「公開、強制、威懾和能力」的基礎原則上。騰博爾提出立法禁止外國政治捐贈；強制在澳洲政界工作的外國代表揭露身分；

並針對政治干預和間諜制定嚴格而漸進式的法律。(在騰博爾推出這些新法律之後的幾天內，報導指出北京可能啟動統戰網絡，對抗一場關鍵澳洲議會補選中「反中共、反華人」的執政自由黨聯盟。)

根據一項民意調查顯示，三分之二的選民支持立法禁止外國干預，僅11%的人反對。然而菁英階層的態度似乎偏離了多數選民的看法。大學、媒體和企業則普遍指責澳洲政府過度擴權，並要求豁免權。如今政府已妥協，將「媒體」排除在祕密與間諜罪之外，議會委員會審查之後可能還會有進一步的行

動。有人批評政府沒有解釋清楚干預問題，其他人則認為澳洲一直把與中共的關係看得太負面。許多人還擔心寬鬆的定義和陳述，有可能會波及所有華人。另一些人甚至嚴厲地表示鄙夷，如雪梨大學副校長斯賓塞(Michael Spence)就曾表示，騰博爾政府應該停止其「恐華的叨絮。」

向民主世界前進

澳洲政體面臨的威脅，是世界上其他國家同樣要面對的，但後者才剛開始認知並面對該問題。從中共主席習近平厚顏無恥地在全球不斷擴張影響力，以及俄國總統普丁與其代理人在歐美所引發之混亂，在在加強了前述認知，尤其在美國總統大選之後，就更難將外國干預貶為一種偏執的抽象概念了。

澳洲是否已經「喚醒」全世界對中共滲透的警覺性？一位五角大廈的資深官員認為基於以下五個原因，答案是肯定的。首先，這場論戰源於華裔澳洲社群，區別了中共目前的作為與其對目標對象的主觀影響力；



其次，澳洲迴避了重要但無益的規範性論點，即有關中共「是什麼」，反而聚焦於經驗性問題，如中共正在「做什麼」；第三，澳洲政府授權進行澈底的跨機構調查，以建構一個堅實的內部共識；第四，參與調查者們努力在開放社會的合法影響與侵入性干預之間，劃出一條明確的界限；最後，這些新制定的原則，將能適用於所有受到隱晦、貪腐或脅迫行為所困擾的國家。

騰博爾的目標在建立維護民主核心價值與制度，這是澳洲在野黨工黨看來會支持的方向。坎培拉也與包括美國在內的其他民主國家尋求達成更多共識，但未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澳洲和民主世界需要強化為數不多的獨立中文媒體平臺，使離散社群不再被迫依賴中共審查過的新聞來源。大學需要建立新的流程來確保透明度、恢復研究獨立完整性，並重建對中國大陸的識讀能力。記者、作家和政界人士則需避免太過自由的概括性描述，以免被中共抓住把柄反擊。外交官們另需確保與中共的關係是實現國家目標的工具，而不是目的本身。

澳洲情報機構已開始展現對中共影響力的擔憂，但現在還需要更進一步行動。若僅停留在警告「主權」可能被侵犯這樣抽象的威脅，還不如清



澳洲與全世界需強化對中共干預之相關作為。(Source: Flickr/Bernard Spragg. NZ)

楚解釋中共手法。雖然美國情報機構今後可能會仿效澳洲的作法，但澳洲應該借鑒美國特別檢察官穆勒(Robert Mueller)的經驗，利用起訴程序作為推動公共教育的機會。到目前為止，記者和政治人物已背負過多的重擔了。

澳大利亞如今已別無選擇，只能繼續努力善用優勢，彌補其開放、多元文化和民主制度的脆弱性。必要時，還得使用間諜戰。但就像所有自由民主國家一樣，只有當能公開以明確證據和合理論述去反擊時，才能真正取得最終勝利。

作者簡介

John Garnaut係JG全球集團創辦人，還是一名戰略顧問。他過去於費爾法克斯媒體擔任中國大陸特派員，並曾任澳洲總理騰博爾的高級顧問。

Copyright © 2018, *Foreign Affairs*. Distributed by McClatchy-Tribune Information Services.